

# 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英文标题：Japan and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白如纯\*

提要：在亚洲开发银行倡议与支持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1992年开始启动。近年来，成员国间取得新的进展。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不断紧密，有效的合作也促进了该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本作为亚行重要参与方和出资方，对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改善与加强的新形势下，日本加大了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参与力度，意在牵制中国主导区域合作的势头，维护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日本与东盟关系 经济外交 东亚共同体

2009年 11月 6-7日，日本首次举办“日本·湄公河流域五国<sup>1</sup>首脑会议”。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 6日与五国首脑进行集体会谈，又于次日分别单独会见。鸠山首相表示：其“东亚共同体”主张能否顺利进展，关键在于湄公河流域；将以新的形式构筑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信赖关系。<sup>2</sup>

就在该“日本·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议”举办前不久的 2008年 3月 30-31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中国总理温家宝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的领导人参会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日本媒体在此期间也对会议做了大量报道。《读卖新闻》载文，对中国在老挝乃至湄公河流域的援助开发活动颇有微词，认为中国是在试图建立面向东盟的战略“据点”，旨在掌握大湄公河流域开发的主导权。<sup>3</sup>

回顾战后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全面而密切的关系，联系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与进展，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与大湄公河区域各国合作

---

\* 白如纯，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东亚区域合作等。

<sup>1</sup>日本单独与中国之外的五国单独举办首脑会议，其意图在于通过对该区域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援助，避免被边缘化。

<sup>2</sup>参见日本放送协会网站 <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600/29457.html> 报道。

<sup>3</sup>（日）《读卖新闻》2008年 3月 27日。

的未来，不难理解日本对于身处该次区域合作框架之外的迫切心态。

### 一、背景：东南亚成为战后日本地区外交重点

二战后期，日本占领东南亚大部地区，把掠夺的资源用于扩大侵略战争。战败后，日本先是处于美军占领，其后又置身于“美主日从”的外交框架之下，加之亚洲各国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戒备，日本开展政治外交的空间十分狭小。于是，日本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面对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和能源紧缺的状况，日本选择了扩大海外商品市场、拓宽海外能源与资源进口渠道的发展道路。由于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其战前的主要资源供给基地，地理相近、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东南亚便成为日本地区外交的首要对象。

1954年10月，日本以援助国身份加入“科伦坡计划”，凭借其资本与技术的实力，巩固并增强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本对东南亚的产品出口迅速增多，从东南亚的资源、能源进口也迅速增加，双方逐步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

鸠山一郎内阁(1954.12-1956.12)时期，日本明确地把“推进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强调“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谋求与东南亚诸国正式建交并打开经济关系”。1957年，岸信介首相更是在半年内两次出访东南亚、南亚国家，成为战后首访东南亚的日本首相。岸出访的目的：一是凭借与东南亚各国在赔偿与建交谈判进展顺利之机，推进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二是谋求充当“亚洲领袖”，巩固在政治上作为“亚洲代言人”的地位；三是欲摸清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这一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强调日本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阵营相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立场”的“外交三原则”。岸信介在访美之前首先出访亚洲各国，其意还在于增加访美时的讨价还价筹码。可见，日本充分利用了美国出于冷战目的而急欲撮合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的心理。1966年4月6日，东南亚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战后日本首次举办的国际会议，其初衷是借配合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亚洲经济开发构想”之机，展示“自主性”外交，博取东南亚国家的好感。至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完成对东南亚各国战争赔偿谈判，双边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日本经济外交成效显著，以致出现了东南亚各国的对日印象和舆论逐渐好转的局面。以1967年8月8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发表《曼谷宣言》为标志，东盟作为亚洲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正式登上

世界舞台，引起广泛关注。此时的日本已相继超过英、德，成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在亚洲经济中一枝独秀，具备了独自开展经济外交的雄厚实力，与东盟的外交在向经济关系倾斜的同时，政治与文化关系也开始得到加强。从岸信介战后首访东南亚国家为起点，70年代佐藤、三木、田中内阁也都在处理对东盟国家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方面加大力度，由政府到民间，从贸易、投资到“政府开发援助”，东盟在日本亚洲外交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越战结束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后，东盟在地区的作用日趋明显，也给日本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提供了机会。1976年12月，福田纠夫组阁，借东盟成立10周年之机率团于1977年8月遍访东盟。在马尼拉，福田发表了《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主要内容有三点（1）坚持和平路线，不做军事大国。（2）在广泛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3）积极提供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三条被称为“福田主义”。

“福田主义”出台，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是标志着日本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成功与调整，即由注重“赔偿”、贸易、援助为中心的“经济外交”向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转移。尽管经济因素在日本对东盟外交中一直起重要的作用，但政治外交色彩逐渐增加。第二个标志是东盟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整体力量增强。东盟成立后，经过几年的调整，外交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增强。1971年11月，东盟第一次外长会议召开，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表示对外“用一个声音讲话”并谋求中立；对内强化经济合作与发展。东盟作为统一、独立的整体力量第一次明白地显露出来，自然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确立了走向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发挥地区主导作用的实力与愿望同步增强。而东盟的支持被日本视为实现该目标的必要条件。中曾根组阁后，除继续强化日美、日欧等传统关系外，把东南亚放在亚太外交的重要位置。福田以后的历届内阁也都重申：尊重东盟的主导精神、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作军事大国。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进入重新调整、定位期，日本外交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适逢柬埔寨和平问题成为本地区焦点，日本以参与对柬维和行动为契机，加大了对东南亚外交的步伐。1991年5月，海部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引述吴作栋的观点，认为在21世纪初期将出现由东北亚、印支三国和东盟结成的“繁荣的三角形”，并“预言”日本和新加

坡将作为此三角形的两个极点,成为推动地区繁荣的不可缺少的伙伴。日本表示愿为使东盟与印支三国结成伙伴关系提供合作。在海部的建议下,次年在东京举办了有关“柬埔寨复兴”的国际会议,日本对包括越、老、柬、缅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共同繁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务省筹办了“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1993年1月提议,1995年2月实施)。几乎与此同时,时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提出建立“印度支那产业合作组织”的建议,并于次年3月在曼谷召开了有东盟六国、印支三国、缅甸加上日本参加的国际会议。日本学者认为,在由十国组成的大东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1997年下半年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导致日本与东盟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一个分水岭。危机发生后,日本在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支援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旨在建立由日本主导下的亚洲经济、金融秩序。由于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的反对和东盟国家态度消极等因素,该构想最终受到挫折。

2002年初,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东盟,发表了题为《东亚中的日本与东盟》的演讲,小泉首相在访问与演讲中,重提“福田主义”,表示了日本对东盟国家一如既往的重视态度。尽管历史背景不同,但福田与小泉两次访问的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稳定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巩固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小泉的访问更显示出日本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新趋势,即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并重新向经济外交领域倾斜与回归。

由此可见,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东西方冷战格局的限制以及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影响,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东盟最初入盟的几个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上半期,日本与印度支那三国及缅甸改善关系成为新的重点。

## 二、现状:日本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大湄公河流域六国次区域经济合作(GMS)迄今已经10余年,尽管中间几经挫折,但近年来中国与该流域其他五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

---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是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即中国(主要是云南、广西两省区)、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亚行作为参与方和出资方,主要负责为有关会议及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域处于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在自然资源开发、市场潜力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从 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来，亚洲各国以及东盟对该地区合作都高度重视，纷纷参与到该区域合作中来。从亚洲开发银行的计划出台伊始，日本就加大了在该地区的参与力度。日本外务省先后主导并召开了“印支综合开发论坛”，日本经团联海外咨询企业协会对大湄公河流域地区的经济、社会、投资、贸易、产业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日本参与湄公河开发合作的一整套计划。

此外，日本还积极要求参加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并已获准成为该合作机制的核心国。在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由于日本占亚洲开发银行的股份最多，自然就有了中国和日本不可避免的主导权之争。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在区域合作中地位提升，曾视东盟为“后院”的日本自然产生一种失落感，日本加强与后加入东盟的印支三国（越、老、柬）的关系，在投资、援助、合作等领域展开充分合作，其用意不言而喻。

事实上，日本一直是参与大湄公河区域合作最重要的域外经济力量。由于担心中国参与的该区域经济合作可能导致日本的利益受到威胁，日本 2003年 10月曾对东盟提议，在当年 12月份的日本-东盟东京特别首脑会议期间，举办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 5个成员国首脑会议，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在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期间，召开上述会谈的计划无法实现。但该会议签署的《行动计划》中，表明“日本将在人才培养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上，在今后三年分别出资约 15亿美元”。<sup>5</sup>

更有日本学者从交通动脉看到了构建一个“新兴经济圈”的潜力。一些日本公司敏锐地发现，处于中印之间的该区域有着足以构建一个小经济圈的禀赋。2008年 1月 16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首届日本·湄公河外长会议，将向湄公河流域五国——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提供约 2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以构建所谓的“东西走廊”物流网络。所谓的“东西走廊”，实际上就是从横向穿越湄公河流域的物流通道。“东西走廊”有两条，第一条“东西走廊”东起越南岷港，经老挝南部、泰国东北部，至缅甸毛淡棉港的交通线及沿线经济带，全长 1450公里（见图 1）；另一条是连接泰国与柬埔寨的“第二东西走廊”，

---

<sup>5</sup> 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 3月 31日。

总长为 1000公里。这两条走廊是东盟内陆国家的经济大动脉，对在东盟中经济较为落后的柬埔寨、老挝、越南而言尤为重要。但是“东西走廊”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尤其是在宽大的湄公河上建设公路铁路桥，是这些国家难以独立承担的。而日本就是瞄准了这一点，这次拿出 2000 万美元的巨额资金，企图拿钱来敲开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大门。

图 1: 日本援建的东西走廊<sup>6</sup>



《产经新闻》称，日本援助建设“东西走廊”，是要对抗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日本看到中国通过援助修建南北干线道路，即所谓的“南北走廊”加深了与流域各国的联系（见图 2）。中国与东盟大湄公河流域的开发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尤其与泰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

2006年，总长 2000公里的昆明到曼谷的高速公路完工通车。中国云南、广西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随着昆明到曼谷的南北走廊的建设，日本媒体指出“南北走廊是‘南进’东南亚的重要动脉，对中国方面有很多好处”。<sup>7</sup>

图 2: 中国主要出资的南北走廊<sup>8</sup>



日本显然对这种形势感到坐立不安，急于要寻找能够制衡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的“据点”，此时“东西走廊”就进入了日本的视野范围。作为该地区的海外最大直接投资国和援助国，日本

<sup>6</sup> 图 1: 转引自 <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600/29457.html>

<sup>7</sup> (日)《读卖新闻》2008年 3月 27日。 <http://www.hjcf.net> 2008-03-31 10:32:00 国际先驱导报。

<sup>8</sup> 图 2: 转引自 <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600/29457.html>

加大支持建设横贯湄公河的东西走廊的力度,在中国与其他五国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

上述交通十字架向东向南连接海上东盟国家;向西则延伸到印度,实现湄公河与恒河的连接;向北延伸到中国,从而成为亚洲腹地的新经济增长枢纽。而且这一地区劳动力价格优于中国,物流和地理条件优于印度,日本当务之急是把集中在中国的生产据点逐步转移到次区域。事实上,早在几年前,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便已经开始大幅向这一地区倾斜。在2008年1月16日的会议上,日本还对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贫困三角地带”的具体支援对象作出决定,并确定2008年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扩大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而在2008年3月28日,日本与东盟正式签署了首个经济合作协定,将在10年内取消东盟产品(大米除外)93%(按贸易额计算)的关税。这项仪式选择的时间恰在次区域六国领导人会议前两天。共同社报道,在日本长期以来通过政府开发援助,以及通过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基础设施完善的湄公河流域开发一事上,有关各国开始了主导权竞争。对于中国与有关各国的合作前景,日本援助团体有关人士指出:“湄公河将来有归入中国经济圈的趋势。”

早在2001年11月,泰国、越南和老挝就决定兴建一条连接三国的主要公路,并取得了日本提供贷款兴建桥梁的承诺。东西通道的建成,将对投资东南亚的日本企业提供更多开展商贸活动的机会。2004年2月下旬,在泰国边境穆达汉召开了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政府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以及东西走廊沿线的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政府有关人士参加的国际会议。据日本《读卖新闻》和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提供81亿日元的援助,在沙湾拿吉(老挝)与穆达汉(泰国)之间兴建一条全长为1600米的跨国桥梁。此桥梁为亚洲开发银行规划的“亚洲高速公路计划”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的东段将从泰国城市穆达汉经过老挝的沙湾拿吉到越南的深水港口岬港。<sup>9</sup>

而本次由鸠山由纪夫内阁主办的首次“日本·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再次承诺将在3年内提供5000亿日元的援助,以帮助五国建设“东西走廊”、“南部经济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用于新能源开发,保护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等方面。<sup>10</sup>

---

<sup>9</sup> 图2参考《朝日新闻》网站

<sup>10</sup> 据日本媒体报道,该援助将以日元贷款的形式提供。参见朝日新闻网站

### 三、解析：中日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实力比较

二战后的近半个世界特别是到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当之无愧地是领跑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但“失去的 10年”（准确可以说不止 10年），使得日本经济仍处于艰难复苏乃至停滞状态。相反，中国经济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再次得到相对大幅提升。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火车头的趋势明显。就目前中国与五国合作的现状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展而言，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目前是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最有活力与潜力的经济体之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的合作从 1992年至今已经历近 20年。各国合作态度明确，合作形式丰富，合作效果明显。尤其是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做出牺牲。同时，还投入数十亿美元参与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援助行动。对 2010年生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计划，中国许诺对湄公河流域内最不发达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政策。

就外交决策模式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一旦确立对外战略目标，就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存在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牵制；同时中国政府能够做到为了某个长远的政治目标，可以牺牲某些眼前的经济利益。中国是东盟区域外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并同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在讨论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积极务实的态度，努力同东盟国家达成一致，尊重并照顾次区域内的弱小国家的利益。这些必将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信任。<sup>11</sup>

日本在发展同东南亚关系的优势是双方强大的经济联系；日本和东盟国家在经济上有极强的互补性。日本有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大量有待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而东南亚有丰富的资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五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战后很长一个时期，日本是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外资投资国和最大的官方援助国。

---

<http://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1106/TKY200911060427.html>

<sup>11</sup> 张锡镇：中日在同东南亚合作中的优劣势，

<http://japan.people.com.cn/2002/4/16/200241682123.htm>

日本与中国竞争的一个明显不利因素是农业问题。日本农民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坚决抵制对外来廉价农产品开放本国市场。正是受制于这种牵制，所以日本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明显落在中国之后。

#### 四、展望：中日协调对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内的东亚区域合作，不是哪个国家单枪匹马能够胜任的简单工程。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如果缺乏有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大国的参与，很多事情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落实起来十分困难。

中国与日本总体上都属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在东亚，日本处在从“经济大国政治弱国”向“经济政治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则处于从“政治大国经济弱国”向“政治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两强并立在历史上是首次，这也决定了两国难以独占领导地位。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长期以来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战后日本率先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在日本的直接带动下，以日本为先导、其余国家和地区经济“雁群”般依次起飞的“雁行模式”在东亚取得成功。在经济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日本在探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尝试。冷战结束后，日本最先与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日本历届领导人在访问东盟国家时，强调尊重东盟主导作用；日本力促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加入东亚合作框架。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在内的东盟各国依旧对日本发挥积极作用充满期待。

中国尽管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较晚，但在促进地区自由贸易等方面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支持东盟主导的“10+3”东亚合作机制；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率先开放市场；对经济落后的东盟国家给予特殊照顾。中国的这些举措让东盟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可以给该地区带来稳定和繁荣，而不是威胁的来源。同时，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参与建立信任措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克制并与东盟进行磋商，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东盟国家对中国增加了信任感。中日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以东亚区域合作为平台，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不仅惠及两国，也是对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贡献。尽管近期内，中日联合主导区域合作的局面还不会出现，但在对待东盟主导的表态上来看，中日双方

均表示接受东盟目前发挥东亚合作机制的核心作用，双方都主张自己是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力量，都尽力拉近与东盟的距离。而这也正是东亚区域合作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之一。从目前以及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一体化的、实力增强的东盟符合东盟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建立多极化和多样化世界。

众所周知，泛东亚整合进程进展不够快，与中日不能通力合作有重大关系，只有中日携手合作，泛东亚区域整合才能有效实现。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批评日本的不足与狭隘，另一方面，更要以博大的心胸包容日本的缺点，给予日本“区域整合共同领导者”的地位，尽量克服现实主义的“零和游戏”观，以长远的眼光、必要的妥协来实现中日合作的深化。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以来，“建设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基本共识和共同目标。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融冰之旅”时，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这一目标并提出了为实现该目标而需要重点推进的六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的一项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和实现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根据温总理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

基于这一认识，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十分广泛，但其中提到的“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共同致力于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开放、透明、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

中日两国关系将给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内的东亚地区合作带来重要影响。从迄今为止的三次大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11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首脑会议，以及三届东亚峰会，可以看出两国都对建立以“东亚共同体”为核心

的地区合作与协调均表现出积极参与态度。包括越、老、柬、缅、泰在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对中日两国能发挥积极作用寄予厚望。由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影响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持续的，所以这一影响不仅存在于两国之间，也涉及到本地区的合作与发展。这种战略互惠关系也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还波及到政治、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

目前，在东亚合作中，东盟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10年来，东盟一直充当区域合作列车驾驶员的角色，掌握着东亚合作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在未来建立“东亚共同体”，首先是东亚经济共同体。作为第一步，是要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东亚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率先与东盟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区进程。日本、韩国也分别与东盟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2007年8月下旬刚刚结束的有六个对话伙伴国代表参加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后，东盟秘书长王景荣预期东盟会在2013年完成和所有六个对话伙伴国的自贸协定：东盟和韩国的自贸协定将能在2008年完成，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预计在2010年达成，2011及2012年可陆续完成和印度及日本的协定，至于和澳新两国的协定则在2012年完成。

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没有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协调与合作乃至共同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东亚经济合作前景将会充满不确定性，“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更会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为达成理想的合作氛围和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中日两国应珍惜目前出现的“回暖”势头，切实把“战略互惠关系”从一个目标变成现实。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走到今天，已经呈现春种夏耕秋收有望的可喜局面。日本作为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如果能以平和的心态继续给与支持、援助与合作，将对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原文刊载于《2010经济蓝皮书》